

科学和性别相关吗？ ——对女性主义科学观的反思

吴 森¹,郑辰坤²

(1.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2. 广西大学社会科学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摘 要: 现代科学的不尽完善,促使女性主义对科学进行深刻反思。她们从科研活动中的性别差异出发,反思并批判了科学领域及其理论体系本身所表现的种种不合理现状,提出了“强客观性”、“反身性”等颇具现实意义的概念范畴,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们为人类反思科学所做的贡献。然而,女性主义科学批判缺乏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以及批判过程本身暴露的各种缺陷,最终导致她们建构女性主义科学体系的愿望不能得到真正实现,而只能成为推动人们追求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 女性主义;科学;反思;批判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3)06 - 0012 - 04

科学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全方位地影响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观念,主宰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然而,在它带给人类无尽福祉的同时,一些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随之而来。人们开始了对科学神圣地位的怀疑、对科学领域出现问题的反思,许多批判西方主流文化的思潮也应运而生。在该背景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作为一支重要的学术力量,也投身到对科学的批判大潮中。

女性主义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研究,科学和性别差异都紧密相连。她们把这两个主题联系在一起,将最初的批判集中在科学领域的性别不平等方面,对科学理论及实践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 (androcentric bias) 进行剖析,揭示了男性与科学发展在本质上相关联的内涵。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已不再囿于对性别偏见的揭示,而是试图扭转这些现状,并主张重建一种“女性主义科学”(Feminist Science),取代传统科学。如今,它的理论发展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一 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

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从最初关注性别问题到后来关注科学,从揭示科学活动中的性别偏见深入到对科学本身的批判,经历了由浅入深、由局部到整体的变化过程,其实质是“从科学研究中的女性问题到女性主义的科学问题”^[1]。通

过它的变化,可以发现她们批判的几个角度:

(一) 科学活动中存在性别差异

性别差异导致不平等是女性主义批判科学的起点。在她们看来,科学活动一直以男性为中心:男性科学家占绝大多数,并处于权威地位;相反,科研工作中女性相对缺席,她们跻身于科学领域将面临重重障碍。即便是那些正从事科研活动的女性,在竞争过程中同样受到不公正待遇,在科学领域中的生存与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和挑战。尽管许多女性科学家试图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获取人们所公认的科学成果,并以此扭转科学活动中的性别歧视,但却收效甚微。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及其学派通过多方面考察研究后认为,科学共同体分层制度体现着平等主义原则,而在女性主义看来,这恰恰是男性权威的代表。因为,这种体制明显反映了共同体中的性别偏见:女性科研人员较少、职位偏低,她们相对稳定的位于共同体组织的底部,在通往高层的道路上举步维艰;而男性在科学界中有更多晋升提级、提高声望的机会。与男性相比,许多女性科学家付出艰辛获得的成绩很少被承认,即便是其中有些成果暂时得到人们的公认,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逐渐被人们淡忘,而极少被载入史册。女性主义指出正是女性科研人员的声望和社会承认程度不及男性,以及科学界中“马太效应”等因素的存在,使不同性别科

【收稿日期】 2003 - 09 - 14

【作者简介】 吴 森(1977 -),女,河南平顶山人,南京大学哲学系科技哲学专业硕士生;

郑辰坤(1976 -),男,河南开封人,广西大学社会科学管理学院科技哲学专业硕士生。

学家之间的地位差距逐渐加大,性别差异日益突出。她们早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努力寻找消除这些障碍的方法。

(二) 性别差异在科学领域的实质是社会性别(gender)的差异

传统观念中对不同性别的定性认为女性不适宜从事科研工作,因为客观、真理、理性、抽象等范畴似乎是和男性联系在一起,而女性与主观、感性、直觉、情感相关联。这种固有观念使人们相信,男性和女性生理特征的不同也导致智力、能力及思维认知方式的差异,因此女性不适于进行科学研究。那些进入高层科研领域并取得杰出成果的女性科学家,则被人们称作“男性化的”,甚至是“变性的”科学家。

女性主义通过对生物学的研究发现,男性女性生理上的不同不会导致行为上的重要差异,对两种性别的划分是在后天造就的。她们指出,自幼儿出生之日起,男孩或女孩被分别置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熏陶,接受不同性别之间有所差异的观念影响。因而,人们观念中两种性别的差异是文化实践和权力关系作用的结果,它不能决定性别的最终定义。她们因此提出,在科学领域被区分的是社会性别。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借鉴了福柯的性别是由社会建构的观点,但她们走得比福柯更远。她们指出,人们受主观因素的制约,相信男性具有客观、抽象、理性的特征,女性则截然相反。这种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体现着代表男性利益的科学发展的需要,它产生于科学诞生之时,并延续至今。基于对社会性别的界定,女性主义认为,所谓科学的客观普遍性、价值中立性只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一种设想,对性别差异根源的揭示是她们的科学反思的理论基础。

(三) 传统科学认知理论基础的二元对立

主客观二元对立是科学认知的基础,但在女性主义看来,它误导了科学的发展。因为二元对立模式导致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感性、心灵与身体的区别,以及男性与女性、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对立。这种对立造成世界的内在分离,并自然地赋予男性优越于女性的权力,带来科学活动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女性主义者凯勒指出,“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公共领域与非公共领域、工作与家庭的区别日益突出,与此相适应的是现代科学在极力促成智慧与自然、理性与情感、客体与主体的分裂。随着女性逐渐失去其特征,使得现代科学产生了一种变质的、世俗化的机械自然观念。”^[2]因而,在女性主义看来,传统模式不仅造成一系列对立体系的产生,也加剧了性别偏见的程度。

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关于认识主体和客观世界的两分,及所谓的客观事实、逻辑体系等均是男性中心主义的观点。因为相对立的范畴通过否定对方来定义自身,而这种传统二分法赋予理性的科学以权威地位,并给予它贬低对立面,进而贬低主观、情感及与此相关的女性的权力。她们呼吁,人们应当抛弃这种典型的男性偏见的科学发展模式,并把为人熟知的二元对立物统一起来,去建构新的知识体系,它必然是一个强调多元性、共同性以及强调对自身进行反思的替代物。^[3]

(四) 科学的客观性

对科学客观原则的批判是女性主义反思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认为,建构在传统科学认知基础上的中立原则中存在对立体系,同时也包含着差异,这暗示了纯粹的客观原则只能是人类的构想。女性主义者凯勒和朗基诺在《女性主义与科学》中写到:“科学发展的进程集中在‘统治的逻辑’,即关注预示到和控制中的现代科学的历史性利益,这正是衡量科学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这种具体性利益的存在摧毁了科学的价值中立原则,因而科学内容的价值是由具体的认识论价值来实现的。利益在权力和控制中代表的只是一种价值,甚至是更具体地、立即清楚地证实暗含在这种权力中的主观与客观。”^[4]此外,“没有不被理论污染的观察”使女性主义坚信,科学具有一定的价值负载,而所谓的客观事实只是受不同观念影响的各主体进行选择、创造的结果。

女性主义揭示了纯粹客观的难以实现,又进一步批判性地指出传统科学客观标准的不完善性。她们认为,这种客观性自定的目标过于宽泛,表面上似乎涵盖了一切,然而它的作用却由于所包含的范围太广而被弱化。正如哈丁在她的著作中所述:“传统客观性概念的问题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太过于严密或客观,而是恰恰相反;它太弱小了,甚至不能实现那些已经设定的目标,更不用说去完成那些被女性主义者和其它新社会运动者称为更困难的计划了。”^[5]女性主义立场论(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进而提出,现存知识都是社会情境化的(Social Situated),但现在处于权威地位的认知主体(男性中心主义者)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其地位限制了他们对自身和周围世界情境的批判性认识,而社会情境的多样性促使他们最终制定的客观原则是非普遍性的,其效用也不能有效发挥。

这被女性主义冠名为“弱客观性”,哈丁相应地提出“强客观性”原则,它要求我们充分考虑“强的反身性”(Strong Reflexivity),即根据社会情境制定符合“好方法”标准的最大客观性(Maximize Objectivity)。在科学研究的每个领域及每个发展阶段的认识主体都参与到客体的发展过程中,并被看作是认知对象的一部分。哈丁指出,“各种客观性在最大程度关注作为观察和反思的直接对象的自然或社会时,必须同时关注观察者和反思者——即科学家和与他们共享假说的更大的社会。”^[6]女性主义提出,许多女性位于社会的较低阶层,她们生活经验丰富,社会情境广泛多样,应从女性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以更大范围内适用的“强客观性”取代旧的“弱客观性”。

二 女性主义科学反思的现实意义

女性主义作为反思科学的重要学术思潮,一直处于不断自我完善之中,它的持续发展向人们展示了其自身具有的一定合理性:

首先,女性主义把对科学的反思与性别联系在一起,对生物、医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进行分析研究,积极探寻两性生理特征及其所反映的外在性别气质,为人类积累了丰富资料。她们首创了社会性别理论,并通过对生理和社会性

别的界定,提出社会性别最终导致性别歧视,从而动摇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性别(生理性别)决定一切”的传统观念。

其次,女性主义在反思科学时,对共同体内部的性别不平等状况进行了批判性的揭示。她们研究表明,科学共同体以男性为中心,女性在其中受着不公正待遇,难以得到与男性同等的自由发展空间,导致了科学领域中男性中心主义、霸权主义的滋生,最终造成科学的畸形发展。女性主义对这些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和批判,利于人们日益关注科学领域的性别歧视,促进人们反思科学体制中的不合理现象,并努力寻找合理解决的方法,引导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再次,与传统的客观性相比,女性主义提出的“强客观性”原则,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认识范畴。而有关“反身性”概念的创造性表述,使人们对科研过程中认知主体的相对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强客观性”、“反身性”的提出,人们对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认识也步入新的层面。它有利于人们全面地探寻并解决影响科学顺利发展的不合理因素,促使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关注科学健康发展的本质需要。

从批判角度看,女性主义以特有的分析方法向科学的不合理性大胆挑战,不断探索科学领域更广阔的空间,成为人类对科学反思批判积累的一笔宝贵财富。

三 女性主义科学反思的缺陷

女性主义的批判涉入科学领域后,让学术界许多学者感到困惑的是:科学研究与性别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联系,如果有,两者又如何相关联呢?的确,从批判本身看,女性主义提出的一系列独特见解所具有的合理性是无可非议的。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她们进行批判的最终目的,是为建构代表自身利益的女性主义科学观,以取代现有科学。其中的缺陷是很明显的:

首先,女性主义在批判过程中,主要采用了隐喻(metaphoric)的手法。她们经过研究发现,许多科学家向人们展示自己的历史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时,常常会运用隐喻或比喻的手法,甚至在对“自然法则”的表达方式上,也往往使用比喻。^[7]女性主义受此启发,把性别、自然、自然科学及比喻紧密联系在一起。凯勒在《对性别与科学的反思》中写到:“性别的比喻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把这些比喻看作是好的丈夫(即科学家)在统治着母亲(自然)。”^[8]朗基诺在著作中也对统治自然被隐喻为和女性的关系、及自然被科学统治和女性被统治一脉相承进行了描述。女性主义在20世纪初培根的著作中发现这样一段话:“我们应当把科学与统治的权力看作是同一事物,科学应被描述为‘自然和她所有的孩子一起为你服务并成为你的奴隶’”^[9]“不要仅仅运用凌驾于自然过程之上的和善指导,科学有权力征服它,并动摇它的基础而击败它。”^[10]女性主义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性别比喻产生于科学的创始阶段,因而在对科学反思时运用隐喻手法,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完全有效。她们提出,“我们需要一个科学内部隐喻的批判性理论,因为它的作用是那么强大。”^[11]

在许多女性主义的著作中,我们不难找到她们使用比喻手法进行研究的例子。她们大量运用了这种方法,甚至是用比喻建构新的科学理论体系。然而,这在科学实践中并不能得到认同。尽管,许多科学家的工作证明,想象和比喻对各门学科理论的创立、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这决不是那种漫无边际的想象和创造。科学是一项严肃的认知活动,它所包含的每门学科都拥有属于自己的、适用范围有限的特殊语言。她们试图通过浅显的比喻或想象手法,描述各学科的具体理论知识,并建构新的科学体系,不仅难以实现,而且是极其荒谬的。因此,如果说女性主义在科学的世界观上有所进步的话,它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却走向了歧途。正如西方许多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女性主义谈论了如此之多的科学,但却不能从事任何科学研究。

其次,女性主义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分,与她们进行反思科学时批判的二元对立相冲突。她们虽然批判现代科学理论基础的二元对立,反对世界的二分,并认为它是世界的的不平等和科学的负效用产生的根源。但对性别问题进行研究时,她们却得出与此观点相违背的结论。在区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尤其是对后者进行相关描述时,她们不仅没有明确地指出两种性别不同,而且叙述所用的语言也模棱两可,甚至是自相矛盾。更重要的在于,女性主义对性别区分本身正是对其批判二元对立模式的诋毁,这使她们对科学的批判难以自圆其说。

再次,女性主义提出的“强客观性”原则,同样表现出明显的缺陷。这种“强客观性”的实质是倡导知识的社会情境化,特别是女性的社会情境对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她们强调,任何知识及科学家的信念都建立在社会经验的基础之上,并最终由社会情境决定,实际上这是对经验主义的复归。此外,这个概念的提出与她们对客观性的批判相矛盾,原因在于:(一)她们一方面对绝对客观性展开批判,认为它不可能存在,另一方面却试图用“强客观性”替代传统科学的“弱客观性”;(二)她们批判传统科学那种充满男性偏见的客观性不具有任何意义,但却倡导以女性社会情境中产生的“强客观性”取代前者。这不仅走向了另一极端,而且最终陷入自相矛盾的漩涡,这也正是她们的批判观点难以被人们接受的重要原因。

此外,女性主义进行批判工作时运用的理论往往也是自己批判的对象,并且她们对于力图重建的科学观,也只能提出一些毫无依据的构想或是做些模糊的概念性描述,而对新科学体系建构程序的细节或框架,不能给出明确详尽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促使女性主义科学观难以得到认同,最终走向了文化相对主义。由于处在与后现代主义并行发展的时期,女性主义不失时机地借鉴了利奥塔、福柯的一些思想,却没有看到他们的思想是立足于文学领域的现代性批判。女性主义夸大了这种批判的作用,并将其推广到自然科学及其认知领域。她们热衷于追求知识的不确定性,相信社会中不同群体的信念和实践标准有所区别,所做解释也不尽相同,但她们却努力追求那些经过不同的阐释,依然能被接受的普遍性理论。可以看出,在对待相对主义的态度上,女性主义

既拒绝又坚持,最终难以摆脱文化相对主义的束缚。

我们不难发现,女性主义的批判大多集中在生物学、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经验性知识占主要成分的学科领域,而对于物理学、数学等建构现代科学庞大体系基础的、逻辑性严密的学科,并未有过多涉入。加上她们的工作较多局限于解决性别偏见问题,因此往往不被人们理会。有力的理论依据的缺乏使女性主义的科学批判暴露出致命的弱点,这种把科学与社会作用、心理因素联系起来的批判,最终只能停留在经验层面上,它不可能真正动摇科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或摧毁整个科学体系。这成为人类对更美好未来的一种向往,同时给人类留下了对科学的不完善反思的广阔空间。在它的影响下,人们会更加关注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但不会因此而用女性主义科学来取代现有的科学体系。

【参 考 文 献】

- [1]参见 Sandra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 9.
[2][7]Evelyn Fox Keller, "Gender and Science :1990". 转引自 The Great Ideas Today, Eneyclopedia Brinannica,1990.

193.

- [3][4][11]参见 Evelyn Fox Keller and Helen E. Longino. Feminism and Science[M].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0、10、2.
[5][6]参见 Evelyn Fox Keller and Helen E. Longino. Feminism and Science[M]. Sandra Harding, "Rethinking Standpoint Epistemology: What is 'Strong Objectivity'?"[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237,244.
[8]参见蔡仲,邢冬梅等译,“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M]. 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70. 转引自 Koretge, Noretta (eds). A House Built on Sand[M].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195.
[9]参见 B. Farrington, "Temporis Partus Masculus: An Untranslated Writing of Francis Bacon",Centaurus,1951. 197.
[10]参见 Evelyn Fox Keller, Feminism and Science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36. 转引自 Francis Bacon, "Descrip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Globe",in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Francis Bacon J. H. Robertson(ed). 506.

(责任编辑 殷 杰)

(上接第4页)

- [5]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1.
[6]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甘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63.
[7]转引自樊浩. 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03.
[8]江畅. 论本体论的性质及其重建[J]. 哲学研究. 2002. (1)
[9]菲利普·弗兰克. 科学的哲学[M]. 许良英(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4.
[10][14][15]瓦托夫斯基. 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M]. 范岱年(译). 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3、29、28.

- [11][19]罗伯特·奥本海默. 真知灼见——罗伯特·奥本海默自述[M]. 胡新和(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71、187.
[12]转引自孙正聿. 哲学通论[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116.
[13]黄瑞雄. 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67.
[16]乔治·萨顿. 科学的生命[M]. 刘珥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49.
[17]乔治·萨顿. 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 陈恒六(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9.
[18]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 许良英(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96 - 197.

(责任编辑 魏屹东)